

1971年“九一三”事件发生后，尽管国外传媒就中国飞机坠毁于蒙古境内及中国净空禁飞等事议论纷纷，进行了种种猜测，但我国的报刊、广播等传媒，在党中央“要把事件保密得尽可能长些，要尽可能赢得时间处理‘善后事宜’，以防不测”的方针指导下，未对此事作任何反应。

林彪事件怎样从高层传到民间

关于“九一三”事件情况的传达，中央采取了“内外有别、有步骤”的逐级传达方式：先党内后党外；先高干后一般干部；先干部后群众。

“小道消息”仍很快扩散到全国

尽管如此，当时还没有得知事件消息的有心人，仍然能够发现一些不正常的现象——首先是中央取消了每年国庆节必有的游行检阅（尽管以“节约闹革命”为借口通知说此后国庆不再举行大规模庆祝活动）；国庆节当天的报纸没有刊载毛泽东、林彪合影的图片；林彪、叶群及黄永胜、吴法宪、邱会作、李作鹏等人，在国庆节期间以及此后的国事活动报道中，全部销声匿迹；在所有报刊、广播的报道中，包括赞颂毛泽东与批判刘少奇的报道中，都不再出现“林副主席”及“亲密战友”等词句。

在中央文件层层传达过程中，尽管消息封锁严密，但这个惊人的信息，仍然飞快地以各种方式向尚未听到传达的、自己信任的“最可靠的人”泄露出去。

陈毅应该是在9月13日当天知道的——那天，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奉命到人民大会堂参加关于“九一三”事件的议事。会议完毕，他按捺不住兴奋的心情，立即赶到三〇一医院，将这个绝密信息，向陈毅报告。但他却不敢明说：“老总，你不是讲‘好有好报，恶有恶

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吗？我今天特意来告诉你，报应到了！到了！因为有纪律，我还不能说明。先让你高兴高兴。”9月16日，北京市委书记刘仁的妻子甘英独自一人在单位从事劳动时，忽然听见有人在她的背后喊了一声：“林彪摔死了！”当她回头看时，却不见了人影。这位在林彪死去4天就知道消息并敢于向她通风报信的人，当然是属于能从高层获知重要信息的非一般百姓。

首都摘下了“林副主席”的画像

9月20日，奉命回国向中央报告温都尔汗坠机事件的驻蒙使馆二秘孙一光，10月3日参加了外交部传达中央文件的大会。他这才知道自己带回国内向周恩来汇报用的那些照片上的死人和飞机残骸，竟是林彪等人的遗体和座机。他甚是诧异：“我的脑袋轰的一下胀得老大老大。竟然是他！怎么会是他呢？”

首都的重要单位以“突出毛主席”为由，摘下了“林副主席”的画像，这当然使不知情的人感到震惊。北京电视台播音员吕大渝回忆：“1971年9月下旬，一群领导突然成群结队地到各处‘检查卫生’。这是前所未有的举动，而且以‘为了突出毛主席，以后一律不再悬挂其他领导人的画像’为由，

要求大家取下林彪的画像，气氛神秘兮兮。当时，有的办公室并排悬挂着毛泽东和林彪的画像……我预感出了大事，但却没有一句质疑。‘文革’已经使我得到了‘言多必失’的惨痛教训。”当晚，吕大渝赶到自己的中学好友孙文冬家打探消息，从孙文冬丈夫李观承那里，得知是林彪出了事。

知青从各种渠道得到消息

在广阔天地“接受再教育”的知青们，在中央文件到达前，不少人已从各种渠道得知了这个消息。

在北大荒劳动的北京知青祝祁是从一位路过的齐齐哈尔知青那里，得知了“九一三”事件。这位知青在讲了以后又嘱咐祝祁：“可不能传给别人，这事非同小可。”祝祁回答：“你放心，向毛主席保证，一定不告诉别人。”次日，祝祁却告诉了他最要好的同学，同时还叮嘱同学：“千万不能外传。”这位知青同样信誓旦旦：“你放心，向毛主席保证，不外传。”但是没过多久，大伙都知道了。

听到过“小道消息”的许多知青，在中央文件正式传达的时候，对林彪叛逃摔死一事仍然非常震惊。曾在崇明岛插队的知青赵丽宏记述：“会场里静得出奇，只有传达这消息的公社干部的声音，在寂静中回荡。”

1971年9月13日凌晨1时55分，

庞大的256号三叉戟飞机带着震耳的轰鸣声，在漆黑的夜空，以500米的低空高度从中蒙边境414号界桩上空由南向北掠过，飞进蒙古境内。这给当地正在举行露天晚会的知青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后来才知道，他们目睹的是“九一三”事件进程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瞬间！

“九一三”事件在百姓中的流传，越来越广，也越来越变形。据说，有些地方以讹传讹，将事件传为：“林彪和另一个（林立果——谐音，下同）老婆都摔死了，摔的地方温度热得出汗（温都尔汗），林彪的三角裤衩（三叉戟）都摔破了，后面跟着一群（叶群），死了好多人……”以及：“林秃子想害毛主席，没得手，开上飞机往苏联跑，临走时还把马克思的大衣给偷走了，又带着老婆一大群（叶群）结果没跑掉，把三叉戟（三叉戟）给跌断了。”

由于中央文件分层次与分类传达产生的“时间差”，在有些单位还一度出现这样的现象：在“早请示，晚汇报”的时候，一些不知情的革委会非党员干部或非党员“造反派”头头还继续虔诚地高声呼喊：“祝林副主席永远健康”；一些地方“九一三”事件的泄密者，其散布“谣言”的行为受到尚不知情的地方公安机关的追查。

（据《党史博览》）

“文革”大字报泄露了多少国家机密？



在“文革”这个大动乱的年代里，大字报制造出一个又一个悲剧，一桩又一桩冤案。不仅如此，大字报还成为有心之人的棋子。美国中情局曾于中国“文革”时期大肆搜刮情报，并对中国领导人的健康情况、从政风格进行大胆分析，而大字报就是中情局使用得最多的情报信息来源。

大字报成了美国中情局的情报来源

由于新中国成立后，中美两国之间没有正常的外交关系，也没有其他经济、文化的往来。因此，美国搜集集中国情报的直接途径相当少。

“文革”期间，美国主要是在香

港、澳门设立情报部门机构，从那些过往中国的外交人员、游客、商人那里搜集各类信息。他们在想方设法获取各类正式文件的同时，也尽量搜集各式各样的出版物，特别是大量有关红卫兵的报纸以及各地的大字报。

由于“文革”期间众多对立的派别互相攻讦，彼此大揭对方的老底，从而披露了相当多不可能从官方的公开宣传中得到的信息，所以美国的情报部门对这些大字报、小字报非常重视。甚至可以说在这个时期，大字报是美国情报部门使用得最多的情报信息来源。基于这些信息，美国中央情报局对中国在“文革”期间的各个方面都给予了密切关注，而中国的政治形势及走向是美国最为关心的问题。

在“文革”动乱期，这些机密被利用并非不可能。北京市档案管理局1966年的“情况反映”中显示，有些群众根据自己的需要，自由阅读档案、公布档案，甚至强制接管档案。这一时期，档案的安全受到很大压力和冲击，失密、泄密的现象，也是相当普遍和严重的。

在“文革”运动中，不少群众和红

卫兵组织利用过一些文件、档案和机密资料，揭露和批判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但是有的机密文件、档案和资料被扩大了阅读范围；有的档案被群众接管；有的人把一些机密文件、档案、资料的内容以大字报的形式公布于众，发生了一些失密、泄密现象。

“文革”时中国领导人被窥伺

美国中央情报局观察中国“文革”的聚光灯，首先照射在中国的最高领导人身上，毛泽东、周恩来是他们观察的主要对象。而毛泽东是核心人物，他的健康状况、行为动机，特别是他发动“文革”的目的，都是美国情报机构关注的焦点。

有关“文革”期间毛泽东的健康状况的情报，主要是简短的情报信息电报，消息的来源则主要是在华外交官，特别是东欧国家的外交人员。其中两份是比较有代表性的：

一份是传闻毛泽东1966年4月初在上海做了喉癌手术，这样小道消息很不确切，况且，波兰医生参与会诊似乎也不太可能；另一份是1967年3月2日关于毛泽东“老态龙钟”的情

报信息电报，说毛泽东“渐老并很虚弱”，“已不能连贯地说话，并经常在说完一句话之前已找不到思路”。消息来源是阿尔巴尼亚驻华大使。暂且不论情况是否属实，可以想见，美国的情报部门只能通过间接的途径来获取有关中国领导人状况的情报。

从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情报看，他们对毛泽东的健康状况大多是捕风捉影和揣测，没有确实的证据，而他们关心毛泽东的健康状况，自然是关心中国政治舞台上权力斗争的展开。

1967年9月8日，中央情报局情报处对周恩来在“文革”期间的表现进行了详细分析，报告认为周恩来需要格外重视。除了他的正式职能外，周恩来也在大字报中被描绘成“‘文革’首席执行官”，他下令采取军事行动、劝说造反派接受引导、制定政策，调解各派系之间的争斗等等。但他同时也扮演着“‘文革’解困能手”的角色，如他曾多次亲自会见众多的来自各省的代表，调解各派系的纷争，并且签署了一些中央委员会支持或批评各省领导人的决定或指示。

（据《读书文摘·青年版》、《窥伺中国》）